

西方修辞学“谋篇布局”中的“情感诉求” 与“人格诉求”^①

王新月 夏爽 袁影

苏州大学

摘要:“谋篇布局”与“修辞发明”“风格”“记忆”“发表”同为西方修辞学中的经典五范畴。然而,相关研究大多局限于在既定谋篇范畴基础上对文本进行应用性分析,未见有对谋篇理论发展脉络及跨范畴谋篇策略的系统考察。本文通过梳理古希腊以降具有代表性的“谋篇”研究,结合亚里士多德三诉求中较受轻视的“情感诉求”与“人格诉求”,探究西方古今修辞学中的主要谋篇策略。考察发现情感诉求和人格诉求需贯穿于谋篇始终,两者有时相互结合,但在置位与功能上各有侧重:“情感诉求”主要用于“引言”和“结语”以激发受众的支持性态度;而“人格诉求”主要用于“引言”和“叙述”以确立言者的威信和美德。此外,情感与人格两大诉求在谋篇中的运用还需契机,应做到既适时又适度。本研究有助于深化对“谋篇布局”核心修辞范畴的认识,增强各类语篇对人格与情感诉求谋篇功能的重视,并可促进学术范畴间的交汇式创新探索。

关键词: 谋篇布局;情感诉求;人格诉求;受众;时机

[中图分类号] H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720(2021)03-0266-12

1 引言

西方修辞学从源头上就体现了包含各种内容策略与语言策略的广义特性。作为内容修辞策略的“谋篇布局”(Arrangement),即“为确保各部分尽得其位对内容进行的排序与分布安排”,^②与“修辞发明”(Invention)、“风格”(Style)、“记忆”(Memory)、“发表”(Delivery)合为西方修辞学经典五范畴。“谋篇”与围绕说服方式的“发明”关系最为密切。据亚里士多德《修辞学》,修辞发明中含有三大说服方式:“逻辑诉求”(Logos)、“人格诉求”(Ethos)、“情感诉求”(Pathos),其中相关论点、论据构筑的“逻辑诉求”与“谋篇布局”的密切关系历来受到研

① 衷心感谢各位匿名评审老师的详细意见以及编辑部老师的悉心修改!感谢那倩、成贤婷、郭蒸颖的修改建议!

② 此定义取自最早对经典修辞五艺进行系统研究的古罗马佚名之作《献给赫伦尼厄斯的修辞学》(Rhetorica ad Herennium),原文为:“Arrangement is the ordering and distribution of the matter, making clear the place to which each thing is to be assigned.”([Cicero], 1954: 7)。

究者的重视；而通过言者的“明智”“美德”“善意”来说服的“人格诉求”^③以及通过对所需情感的激发或增强来赢得受众的“情感诉求”，与“布局谋篇”的关系亦十分密切，但远未引起学界的关注。迄今，我们尚未见到从情感和人格两诉求视角对“谋篇布局”的特征和发展脉络所作的专项考察。因此，本文将通过系统梳理西方古今各大历史时期的修辞学代表作，揭示两大说服手段——“情感诉求”和“人格诉求”——在谋篇中的在场性(置位和频率)、作用方式及相互关系，以期深化对西方修辞学“谋篇布局”范畴的认识，增强对人格与情感诉求谋篇功用的重视，并促进领域内核心范畴间的结合研究。

2 希罗谋篇观：日趋鲜明的情感与人格诉求

西方修辞学中“谋篇布局”原则的阐述肇始于古希腊时期、兴盛于古罗马时期。早在《斐德若篇》(“Phaedrus”)中，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在多处论及谋篇问题，其中尤为突出处是他认为，“每篇文章的结构应该象一个有生命的东西，有它所特有的那种身体，有头尾，有中段，有四肢、部分和部分。部分和全体，都要各得其所，完全调和”(柏拉图，1988: 150)。这一生命体谋篇观无疑体现了对结构中活力的重视，而从下文苏格拉底反复强调文章的功能在于“感动心灵”(柏拉图，1988: 163)，我们似可认为苏氏或柏氏的谋篇观中也隐含了一定程度的人格与情感诉求。这一较为隐约的发端得到了亚里士多德的有力回应。亚氏于西方首部系统修辞学著作中，不仅论及了“谋篇”的具体要素还明确了其与情感和人格诉求的关系。在《修辞学》第三卷第十三章中，他认为谋篇布局有四大组成成分：“引言”(introduction)、“说明”(statement)、“证明”(proof)和“结语”(conclusion)，^④其中对事件的说明以及论点的证明是必不可少的(Aristotle, 1954: 200)。但他也十分重视引言与结语，强调了情感诉求与人格诉求于其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亚氏认为“引言”除了明确演说的目的外，还需消除听众对言者不利的偏见或使其对敌方产生消极情绪，即在“引言”部分需赢得听众的好感，将其现有情绪转变为有

③ “Ethos”这一古典修辞学核心概念有多种译名：“人格诉求”“人格威信”“修辞人格”“人品诉诸”“人品诉求”等，本文采用“人格诉求”这一译法主要考虑是其语义范围较广且最为常用。据中国知网，以此译名为主题词可查到的相关发表文献最多。这一译名也未能完全涵盖原术语下的“明智”“美德”“善意”，但总体上较为接近。

④ 据 Crowley & Hawhee (2012: 223)， “谋篇布局”的研究可能始于公元前五世纪的哲辩师，此谋篇四成分可能已出现在他们的修辞教学中了。

利于言者进行说服的情感。而在全书末章中,亚氏还鲜明地指出,“结语有四种功用:(1)使受众对自己产生好感,对对方产生恶感;(2)夸大或缩小主要事实;(3)激起所需的听众情感;(4)帮助他们回忆要点”(Aristotle, 1954: 217)。在他看来,“结语”的首要功用则是以实现受众情感导向为主,即致力于“增进听众对言说者的好感以及对其对手的反感……触动受众,使之做出[理想的]情感反应”(刘亚猛, 2008: 63)。相比于情感诉求的协助性作用,亚氏在《修辞学》第一卷第二章中认为人格诉求对于说服几乎起着支配性作用,其运用在谋篇中的“引言”和“说明”部分皆有鲜明体现。亚氏指出这两个部分都可通过描述修辞人格来给予受众关于言者自身品质的良好印象,从而增强言说的说服力,但对于诉诸怎样的人格及如何诉诸人格,亚氏并未做具体阐释。同时期,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的老师阿那克西米尼(Anaximenes),在所著《献给亚历山大大帝的修辞学》中论及了相仿的谋篇四成分,还进一步将“引言”和“结语”纳为所有演说类型中的必备环节,并也指出前者的作用一方面是为了使听众熟悉话题、做好准备,另一方面是为了引起他们的好感、使之尽可能倾向于修辞者;而结束语也要赢得受众的好感并应通过提问、提议等与他们沟通的形式重述前面所提到的要点(Anaximenes, 1957: 377-395)。由此可知,在古希腊时期,以情感导向为主的情感诉求和以美德为主的人格诉求在谋篇布局中的作用已开始显现,言者的受众意识已经确立。

谋篇中的成分以及情感和人格诉求的功用在古罗马时期获得了丰富和细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为佚名之作《献给赫伦尼厄斯的修辞学》(*Rhetorica ad Herennium*)、西塞罗的《论雄辩家》(*De Oratoria*)以及昆体良的《雄辩家的教育》(*Institutio Oratoria*)。佚名之作,也称为《古罗马修辞手册》,系统阐释了两类谋篇布局方式:遵循修辞学原则类与酌情而定类。遵循原则类包括六个常规要素:“引言”“说明”“区分”(partition)、“证明”“驳斥”(refutation)和“结语”,即在希腊原有四部结构基础上增加了明确双方争议所在的“区分”(division),即争议点(stasis),以及就敌对方的质疑所作的“批驳”(refutation)。该书谋篇中的“情感诉求”主要出现于“引言”“说明”和“结语”部分;“人格诉求”应用于“引言”和“说明”部分。“引言”需紧紧围绕受众展开,其三大目标是使受众“注意听、听得进、有好感”^⑤(attentive, receptive, and well-disposed)。而“引言”的表现形式亦由受众当下的情感状态所支配,如受众的情感倾向于敌对方或已厌烦于敌对者

⑤ 此处及本段其它术语翻译采用了刘亚猛《西方修辞学史》(2008)中的表述,参见第79-98页。

主题的论述，言者最好采取“迂回诡秘”(subtle approach)而非“直截了当”(direct opening)的方式引入自己的主题。此外，诉诸情感与诉诸人格紧密相关，二者需共同作用于“引言”的铺排。为了寻求受众好感，言者可诉诸于自身人格，通过表现其友善、谦逊、善良等品质来引导受众情绪，实现情感导向的目标([Cicero], 1954: 11-23)。在“说明”部分，情感诉求及人格诉求所产生的效果与“引言”部分相似，即针对自身和敌方诱发两极对立的情感，为观点的阐述做好情感铺垫；而不同之处在于，作者将“说明”部分所要诉诸的情感类型具体化为：希望与恐惧、渴望与质疑等，将人格特征具体化为：严厉与温柔、虚伪和同情等([Cicero], 1954: 25)。“结语”部分的表现方式“扩展”(amplification)和“唤起受众同情心”(appeal to pity)都涉及到如何借助各种手段实现情感诉求。“扩展”是利用十大“常言”(commonplace)原则引导受众情绪；“唤起受众同情心”是指通过各种叙述手段来激发受众的同情([Cicero], 1954: 145-153)。关于酌情而定类谋篇，该书作者认为言者需根据受众状态或情绪来对谋篇要素成分进行取舍或顺序调整，而不是率由旧章，一成不变地遵循原则来呈现各部分。例如观众若已被对方打动，言者可省去“引言”部分，直接提出问题，证明论点([Cicero], 1954: 185-187)，这属于从宏观层面上所进行的情感调控。

西塞罗《论雄辩家》中的谋篇也是六部结构，只是在具体表达上略有差异。他用“叙述”(narrative)代替了“说明”，前者显然更加情感化，更易于吸引听众的注意力。而关于情感与人格的在场性问题，西塞罗认为“引言”和“结语”最适宜于诉诸情感，而“叙述”“证明”和“驳斥”中具有关键性事实的部分也可以对受众情绪稍加引导。比较而言，人格诉求在其谋篇布局讨论中的出现频率较低，主要涉及“引言”和“叙述”部分(Cicero, 1942: 433-451)；但他进一步将这些部分的人格诉求进行了具体论述，认为对重要事件发表意见者必须是睿智的人、品格高尚的人，即言说者需具备“明智”和“美德”的品性，涉及了亚氏人格诉求三要素中最为关键的前两个(另一为善意)。深受西塞罗影响的古罗马修辞教育家昆体良在其十二卷巨著《雄辩家的教育》中至少有两卷论及谋篇中的人格与情感问题。在第四卷第一章中论述“引言”时，他强调，“引言的唯一目的是为了受众进入一种乐意聆听我们的状态”(Quintilian, 1920: 9)；而在第七卷第十章中他以提问的方式更为直接地述及布局中的人格诉求与情感诉求，如“为了获取受众的好感我们必须在人格诉求方面投入多少？”以及“我们应将情感诉求用在结语中

还是将之分布于整个言说中？”(Quintilian, 1920: 169)。这种对人格与情感在谋篇中的投放适合性思索已经涉及了相关时和度的精细考量,可谓开启了后古典时期更为具体的谋篇研究。通过对古罗马时期三部代表作的梳理,我们可以得出这一阶段“谋篇布局”的结构更加完善,有关“情感诉求”和“人格诉求”在铺排中的应用描述也更为鲜明。

3 后古典谋篇观:日趋具体的情感与人格诉求

希罗谋篇观在中世纪至启蒙时期的后古典阶段获得了不同程度和各具特色的延展。中世纪的谋篇观前期和中期基本上延续了古罗马时期的布局修辞,而后期随着“主题布道”新模式的产生体现了自身鲜明的谋篇特征。这一始自13世纪的范式提出了布道需由六个部分构成,即“1.主题:引自《圣经》的一段话;2.预破题(prothema):简要讲解主题的要义并祈祷;3.破题(antethema):介绍和解释布道的目的意义;4.分题:将主题分为三点,用权威意见证明每一个分点;5.小分题:将部分或全部分点再进一步细分为更多小点;6.扩展:通过详细讲解每一分点或小点,将主题扩展为完整的布道文”(刘亚猛,2008:180-181)。这一“学府式的布道”结构是基督教话语摸索出来的一种新修辞模式。该模式对论题极其精细的划分,除了表明其显见的逻辑性外,同时也体现了布道者强烈的人格诉求与情感诉求意识。引自《圣经》的“主题”首先确立了将要述说内容的权威性,继而在布局的“分题”中以权威来论证每一分点,我们可视之以(“明智”中的)权威为核心的人格诉求。这一对论题的细分模式还充分体现了布道者对听众的充分重视——“预破题”中的“祈祷”以及“破题”中针对听众的“意义”明显具有情感诉求的功能。面世于14世纪的罗伯特(Robert of Basevorn)《布道之形态》(*Forma Praedicandi*)则鲜明地体现了布道谋篇中的情感诉求。在他提出的以谋篇为主的布道修辞“二十二法”^⑥中的第2“赢得受众”、第3“祈祷文”、第4“引言”部分均出现了关于情感诉求的相关论述;而关于人格方面,“他提出布道者必须满足三

⑥ 据 Murphy(1971),“二十二法”是:“1.发明主题 2.赢得受众 3.祈祷文 4.引言 5.内容划分 6.陈述各部分内容 7.证明各部分主题 8.内容扩展 9.转换话题 10.在各部分之间建立对应关系 11.对各部分之间一致性的说明 12.在首尾之间建立迂回联系 13.在各部分之间建立交互联系 14.统合 15.结语 16.润色 17.调声 18.配以适当动作 19.适时应用幽默 20.间接用典 21.加深印象 22.按照主旨通盘考虑”(转引自刘亚猛,2008:183),其中的1至15均可视为谋篇部分。

项基本条件,即‘良心、知识和权力’,这种人格力量可以说是渗透于谋篇中的各个环节的”(刘亚猛,2008:181)。

此外,中世纪修辞中十分突出的书信艺术在谋篇布局方面有着更多情感、人格的考虑。始自11世纪意大利修士阿尔贝里克(Alberic of Monte Cassino)所确立的“认可格式”(approved format)规定,一封标准信函需包括五部分:“招呼”(salutation)、“赢取好感”(securing of good-will)、“叙事”(narration)、“诉请”(petition)和“结语”(conclusion)。这五个部分,从其命名来看,基本上是围绕触动收信人的情感或表达发信人的尊重与善意。在12世纪由佚名作者撰写的《书信艺术原则》(*Rationes Dictandi*)对各个部分的阐述中更可见到谋篇中的这两大诉求。如“招呼”是“以一种跟所涉双方社会地位相称的方式表达友好情感的致敬语”;“赢取好感”需从“发信者、收信者、收信者与发信者的相互关系、情境效果、书信内容”五个方面“挖掘出可以加深好感的资源”;而“诉请”则可以通过“诉求、教诲、威胁、劝勉、激励”等九个方面来进行(参见刘亚猛,2008:185-187)。同时,该书作者也强调信件五部分并非定式,发信者可根据与收信者的互动情形进行结构上的减省或次序调整。但无论是灵活处理还是遵照范式,不可或缺的是对相关人品与情感诉求的适时表达。

到了文艺复兴时期,“以人为中心”的思潮影响了诸多研究者,人的生理和情感状态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曾任英国国务卿的托马斯·威尔逊(Thomas Wilson)便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他发表了第一部用英文撰写的修辞学著作《修辞艺术》(*The Arte of Rhetorique*,初版于1553年)。此书分为三卷,卷一简要阐述了谋篇所包含的七大要素:“引言”“说明”“提议”(proposition)、“区分”“证明”“驳斥”和“结语”,即在古罗马时期谋篇布局的“六部”结构基础上增添了“提议”(Wilson,1998:36-38)。在专论谋篇布局的卷二,“他别出心裁地加进了如何扩展内容和调动情感两项内容,丰富了‘组织结构’这一传统范畴的内涵”(刘亚猛,2008:210)。具体而言,“情感诉求”主要在“引言”和“结语”部分呈现,“人格诉求”也可在“引言”部分寻到其踪迹。“引言”的形式取决于受众所处情感状态,可视为对古罗马相关论述的继承与发展。如受众已处在适合劝说的情感中,则可采用“直接引言”(plain beginning)的方式进行论述;如受众的心理状态与接受劝说所需情感之间的距离较远,言者可以采用“暗示法”(insinuation)循序渐进引导受众情绪。同时,情感与人格在“引言”部分相互贯通,共同促进论辩的发展。“引言”部分

为实现赢得受众好感的目的,诉诸于自身美德,展现勇敢、善良或忠贞等品质,给受众留下良好印象,与之实现情感同一(Wilson, 1998: 107-109)。威尔逊对“结语”的论述更为详细,探讨了实现情感诉求的具体策略。在介绍的两种结束方式中,“总结”(summing up)要求语言简洁凝练、句式多样、内容紧扣主题,以愉悦受众、实现说服目的;“扩展”(amplification)则提出了引发或增强受众同情或喜悦等情感的具体门径,如隐喻、层递、对照等辞格,言者的嗓音、表情、动作、眼神等身势语表现(Wilson, 1998: 118-137)。他甚至直接指出,“只有使受众高兴才能赢得他们,造成受众厌烦则将永远失去他们”,并视其为“所有言说者都必须遵守的一条铁律”。^⑦可见,文艺复兴时期的谋篇观是在顺应时代背景下对希罗时期布局观的发展,谋篇中关于激发受众同情、喜悦等良好情绪的专节论述体现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文关怀的特点。

理查德·惠特利(Richard Whately)和休·布莱尔(Hugh Blair)是18至19世纪启蒙时期修辞学研究的代表性人物。惠特利认为合适的论点和巧妙的“谋篇布局”一直都被视为修辞学的专属领域。他的《修辞学原则》(*Elements of Rhetoric*)采用与“谋篇布局”概念相近的“论辩性话语构筑”取而代之,主要探讨不同类型的“论点”如何铺排。卷一论述了“情感诉求”对“引言”的影响及对“结语”形式的要求,惠特利认为在“引言”中激发受众情感,可以触发受众对言者的情感认同,形成对敌对方的偏见;“结语”部分最忌长篇累牍消磨受众的耐心,引起受众的反感(Whately, 2010: 168-174)。卷二部分主要讨论了“情感诉求”在论辩过程中的效果,即受众情感应随着推理的深入而逐步增强,最后达到言者所需的理想的情感状态。比如,论辩过程中,首先要证明存疑点,引导受众形成或是同情或是感激的情感状态;一旦受众理解言者所要表达的中心思想,情感也要随之达到应有的高度(Whately, 2010: 191)。而关于“人格诉求”,惠特利认为言者要了解人性的伟大与脆弱,论辩过程中需表现明智与善意,充分利用“人格诉求”影响受众;并认为如果人格诉求应用得当,其效果甚于逻辑诉求(Whately, 2010: 179-180)。

休·布莱尔在《修辞与美文》(*Lectures on Rhetoric and Belles Lettres*)的第31章到第32章专门对谋篇布局各要素进行了深入研究,谋篇中的受众与情感是其关注的重点。布莱尔认为一般的布局由六个部分组成:“引言”“区分”“叙述”“论据”“诉情”和“结语”。他在“引言”部分聚焦于人格诉求要素具体应用的同时

^⑦ 引自刘亚猛《西方修辞学史》(2008: 213),前引为其翻译,后引为其转述。

也论及了情感诉求。布莱尔独创性地提出“引言”需要遵循的六条重要原则，其中第三条和第四条原则对于情感诉求和人格诉求的实现意义非凡。前一条要求言者态度谦虚，这是因为一旦以傲慢的态度进行开场，观众就会产生怀疑抵抗的情绪，影响后续一系列言说的进行；同时，谦虚的态度有助于言者构筑公正、善意、理解的言者形象，以此引导受众情感，使受众对言者保存善意。后一条要求“引言”以平缓的方式进行，受众的情感应随着文章的展开而增强。这些与“情感诉求”相关的原则在“诉情”部分得到了更加严谨细致的阐述。“诉情”(the pathetic part)，换言之，即为诉诸于情感，是情感诉求在其谋篇观中的直接体现，凸显了该诉求在布局谋篇中的重要性。在这一部分，作者提出了七大必要原则：第一判断主题是否适合诉诸于情感以及何时诱导情感最为妥善；第二不要为了激起情感而在形式上拆分文章，不要预告观众所要采取的情感策略，不要试图呼吁观众跟随自己的步伐；第三言者应使受众明晰其所欲求的情感与真正的实现仍有差距；第四感动自身是最行之有效的诉情方式；第五情感诉求的使用要求言者语言得体，避免堆砌生硬、华丽的辞藻；第六避免其他技巧同时使用，如不合时宜的“比较”和“论辩”；第七诉情要适度。此七大原则有助于在语言、内容和铺排上具体而适切地运用情感诉求来赢得受众。诉诸于情感的观点在其论述“结语”的部分获得了强化。他认为“结语”可成为诉诸情感的集合点，“结语”的情感导向需与整篇文章的情感导向相一致，并指出需把握好“结语”的时机性，结束得猝不及防、或磨磨唧唧、或不孚所望等非理想的结束状态均会影响受众的心理倾向、妨碍情感诉求的实现(Blair, 2005: 344-367)。布莱尔谋篇观中所倡导的诉诸于情感和人格的原则具体而深刻，对后世的布局谋篇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4 现当代谋篇观：日益充盈的情感与人格诉求

西方现当代研究者从修辞学的一些主要视角对谋篇布局进行了丰富而深入的探究。尤具代表性的有，欧洲修辞学领航者钱姆·佩雷尔曼(Chaim Perelman)从劝说、受众及方式对论据铺排所作的研究，美国著名修辞学家爱德华·科贝特(Edward Corbett)与罗伯特·康纳斯(Robert Connors)从三大诉求角度对谋篇进行的细致分析，还有当代资深修辞学者莎伦·克劳利(Sharon Crowley)与黛布拉·霍黑(Debra Hawhee)对古典谋篇理论中人格、情感诉求策略所作的深化研究。

佩雷尔曼在《新修辞学·论论辩》(与 Olbrechts-Tyteca 合著)中的第三卷从劝

说、受众、方式三个角度探讨谋篇布局问题,其中,情感诉求和人格诉求相关论述主要出现在受众篇中。佩雷尔曼等首先区分了普世受众(universal audience)和单一受众(single audience),认为受众的性情不同,对演说的情感反应会有所差异,因此需要言者在论辩过程中分辨受众的情感状态;厘清受众情感状态后,言者可以诉诸人格,利用自身的人格魅力造势,为论辩的铺展奠基。此外,作者提到三种影响受众情感倾向的论据安排顺序——渐强式、渐弱式、聂斯托利式。对众多修辞学者来说,渐强和减弱的顺序会使受众消极情绪增强,积极情绪削弱,难以在“结语”部分实现情感激发的目标;“聂斯托利顺序”(Nestorian order)备受青睐源于其首尾强中间弱的安排模式更利于情感的诱发与实现。而佩雷尔曼认为“聂斯托利顺序”因其拘泥于论据呈现顺序的固定性而存在争议。论据呈现顺序取决于普世受众和单一受众的情感倾向,具有对呈现环境的适应性和高度的灵活性特征。但这并不意味着,面对普世受众和单一受众时所采取的谋篇策略泾渭分明,普世受众的某些特征或与单一受众交织重叠而体现出近似的铺排形式(Perelman, 1971: 495-502)。

与佩雷尔曼等对论据顺序的关注不同,科贝特与康纳斯在《古典修辞学今用》一书的第三章则从三诉求角度考察谋篇布局。该书继承了古罗马时期的“六部结构”,而在“引言”“叙述”“批驳”和“结语”部分对情感和人格诉求的应用方式及应用时机进行了阐述。他们认为“引言”需告知受众主旨并赢得受众好感,前者可采用疑问式、叙述式等来吸引受众注意力,诱发所需情感;而后者与人格诉求紧密相关,作者们认为,在“引言”阶段获取受众信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此处“人格诉求”的使用或是需表明自己胜任某主题的论说,或是需引导受众注意对方的问题,但无论是表明自己的能力还是暗示他人的缺陷都应适时适度,否则会适得其反。“叙述”部分,他们着重于人格诉求与情感诉求的互动过程,指出言者可通过勾画适宜场景来活灵活现地展示所叙之事以引导受众的情感;然而,所叙之事是否可信、能否实现“情感诉求”又取决于话语本身的伦理(人格)基调和言者的伦理形象。至于“批驳”,该书则认为,误用情感诉求、比例不当的情感诉求和出现在不当位置的情感诉求或会削弱批驳的效力或会使所积累的自信受到打击,并认为受众群体的区别性特征会影响情感诉求的效力,区别越大,诉诸情感进行劝说的难度越大,因此言者需提前评估何种“情感诉求”形式可以最广泛地影响受众;而“人格诉求”在“批驳”中发挥作用的恰当时机是在批驳处于虚弱

无力之时，他们指出这种人格诉求或是基于言者的形象，或是基于话语的伦理基调。“结语”部分，他们对“情感诉求”的时机和方式进行了着力阐述，认为是否诉诸情感及在情感上下多大的功夫完全取决于受众的脾气秉性，而诉情的方式，该书认为浓烈夸张的情感诉求方式已过时，温和的方式更受当今受众和研究者的青睐^⑧；至于“人格诉求”，该书认为“结语”才开始运用此诉求以赢得好感为时已晚，“结语”部分的人格只是对早期人格诉求的更新与强化，此时袒露自己的缺陷、承认对方的长处最为合适，受众会认为敢于在结尾披露自身短处和慷慨向对方让步的人不仅品行高尚，而且对于自己的论点也尤为自信(Corbett & Connors, 1999: 256-292)。

克劳利和霍黑在《古典修辞学的当代性》一书中不仅总结了亚里士多德、西塞罗和昆体良等修辞学大家的谋篇观，也发表了她们自身对谋篇布局相关策略的看法。值得一提的是该书在“引言”“区分”和“结语”部分有关情感、人格诉求的独到阐述。“引言”部分，通过举例说明，她们总结了西塞罗关于使受众易于接受话题的几种方式——加强自身的修辞人格(strengthen your ethos)、削弱敌对方的修辞人格(weaken ethos of those who oppose rhetor)、尊重受众(show respect for audience)以及称赞己方论点、驳斥反方论点(praise the issue or your position on it while denigrating the positions taken by the opponents)；其中对自身修辞人格的加强和对受众的尊重是诉诸人格的重要方式，体现了人格诉求在“引言”部分为赢得受众善意所发挥的关键作用。有关“区分”，她们指出言者利用“区分”的功能性特征(确定及梳理论辩主题)进行论辩，会给受众留下“明智”且“友善”的良好印象，是对人格诉求的有效应用。更为瞩目的是，作者们在“结语”的策略讨论中就情感诉求和人格诉求列举了可采纳的话题，如诉诸“权威”(the topic of authority)、揭示效果(the topic of effect)和预设未来(the topic inquires what would happen)等；这些话题还有助于言者确定情感诉求、人格诉求应用的适时性与适度性(Crowley & Hawhee, 2012: 222-243)。^⑨

⑧ 他们以林肯为例说明温和的情感诉求方式可以借助对词语的斟酌及句子节奏和结构的选择来实现，这种对情感诉求应用方式的关注证明近现代以来对情感的使用更趋严谨，更为克制。

⑨ 此外，曼弗雷德·克劳斯在对比《献给亚历山大的修辞学》和亚里士多德《修辞学》在说服手段上的异同时认为，前者所预设的人格诉求要素之一是“言者的个人意见”(speaker's personal opinion)，主要应用于章节的结尾；而人格诉求中保持受众对言者“善意”则主要彰显于章节的开篇(Kraus, 2011: 276-277)。

以上的分析表明,情感和人格诉求除突出地应用于古典和后古典修辞学家常提及的“引言”“叙述”和“结语”部分外,现当代修辞学者也在“批驳”“证明”和“区分”方面对之有所阐述,说明情感与人格的诉求需贯穿于全篇,只是在文中各部分发挥作用的强弱或方式有所不同。其实,一些研究者已就谋篇中诉诸情感与人格的时机性以及错失时机的后果等进行了探讨,丰富了“谋篇布局”中的情感与人格诉求理论。

5 结语

本文以“情感诉求”与“人格诉求”为视角考察西方修辞学中“谋篇布局”理论的发展。我们发现古往今来的大多数研究者在相关讨论中并没有直接表明两大诉求与谋篇的相关性,需要寻踪觅迹,加以整理提炼。通过对主要历史时期代表作中谋篇观的考辨与整合,我们发现“情感诉求”和“人格诉求”在“谋篇布局”中有以下几大特点。首先,情感与人格的诉求需贯穿于全篇,只是其主要置位和使用频率存在差异,“情感诉求”主要用于“引言”和“结语”部分,同时穿插在叙述和论辩之中;而“人格诉求”主要用于“引言”和“叙述”部分。由此可以窥知,理想的谋篇布局中诉诸情感的策略往往要比诉诸人格的策略更加凸显、更加常见。再则,“情感诉求”与“人格诉求”并非毫无交集,两者往往相互配合、共同作用于谋篇,以愉悦受众、实现说服,如在“引言”和“叙述”部分,通过展示言者的修辞人格(明智、美德或善意)以求引导受众情绪、使之接近说服所需的有利情感。此外,情感与人格两大诉求在谋篇中的运用还需契机,既要适时又要适度,前者需注意恰当的置位,后者需注意含蓄等表达方式。以上的总结虽具有普遍性,然而不同的语篇类型,在布局中对于情感与人格诉求的运用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如布道与书信中对于两大诉求的运用更为突出,学术语篇的安排中情感诉求和人格诉求则未必明显,但很多科研著述也因此让人读来无味,提高可读性以赢得更多读者的有效途径应是增强两大诉求的运用。学术界已悄然兴起的以情趣性、人文个性为表达特征的“毕达哥拉斯文体”(参见吴子林,2017等)预示着情感与人格的诉求将日益受到包括学术型在内的各种文类的青睐,它们将与历来广受重视的逻辑诉求一同成为谋篇布局中不可或缺的内核要素。^⑩

^⑩ 限于篇幅,此项研究未能涉及汉语修辞研究史中丰富的谋篇观,但我们此前已作相关探索(参见夏爽、袁影,2020:66-71)。

参考文献

- 柏拉图. 文艺对话录[M]. 朱光潜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8.
- 刘亚猛. 西方修辞学史[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8.
- 吴子林. “‘毕达哥拉斯文体’——维特根斯坦与钱锺书的对话” [J]. 清华大学学报, 2017(3): 178-190.
- 夏爽、袁影. “布局谋篇”中的逻辑与情感——中西修辞谋篇观略考[J]. 国文天地 (台湾), 2020(3): 66-71.
- Anaximenes. *Rhetorica ad Alexandrum* [M]. W. S. Hett & H. Rackham (tran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 Aristotle. *Rhetoric* [M]. W. R. Roberts (trans.). Toronto: Random House, 1954.
- Blair, H. *Lectures on Rhetoric and Belles Lettres* [M]. Carbonda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2005.
- Cicero, M. T. *De Oratore* [M]. E. W. Sutton & H. Rackham (tran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2.
- [Cicero, M. T.]. *Rhetorica ad Herennium* [M]. H. Caplan (tran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 Corbett, E. & Connors, R. *Classical Rhetoric for the Modern Student*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 Kraus, M. How to classify means of persuasion: The rhetoric to Alexander and Aristotle on *Pisteis* [J]. *Rhetorica*, 2011, 29(3): 263-279.
- Murphy, J. J. *Three Medieval Rhetorical Arts* [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
- Perelman, C. & Tycha, O. *The New Rhetoric: A Treatise on Argumentation* [M]. J. Wilkinson & P. Weaverl (trans.). London: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71.
- Quintilian, M. F. *Institutio Oratoria* [M]. H. E. Butler (tran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20.
- Sharon, C. & Hawhee, D. *Ancient Rhetorics for Contemporary Students* [M]. Boston: Pearson Education, Inc, 2012.
- Whately, R. *Elements of Rhetoric* [M]. Carbonda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2010.
- Wilson, T. *Arte of Rhetorique* [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8.

通讯作者：王新月 <3150424374@qq.com>

215006 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东环路 50 号 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ncepts of “construction” and “sign”. Sharing the same essence, they are the unity of form and meaning. A construction is a sign or a string of signs. Different constructions result from symbolic movement and solidification of strings of continuous, discontinuous or upper symbols. The concept of construction, a supplement to linguistic semiotics, expands the latter’s scope and composition, and enhances its explanatory pow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rbitrariness and the motivation of language signs can be convincingly accounted for by construction theory.

Keywords: sign; symbolization; construction; cognition

“Pathos” and “ethos” in “arrangement” (p.266)

WANG Xinyue XIA Shuang YUAN Ying (Foreign Languages College,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215006, P. R. China)

Abstract: “Arrangement”, “invention”, “style”, “memory”, and “delivery” constitute the five canons of Western rhetoric. However, previous studies on “arrangement” are mainly confined to its application in discourse analysis; a systematic survey of its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in relation with other categories is unduly neglected. Upon surveying the representative works from ancient Greece downward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development of “arrange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athos” and “ethos”. The findings demonstrate that the two appeals, sometimes intertwined with each other, play a role throughout the passage, but their emphasis is rather different in position and function. “Emotional appeal” is more expected in the “Introduction” and “Conclusion” to excite the supportive emotions from the audience, while “ethical appeal” takes more effect on the “Introduction” and “Narration” to help the rhetor establish authority and morality. Besides, in employing pathos and ethos, right timing and proper measure should be well managed. This inquiry contributes to an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arrangement”, to a stronger awareness of pathos and ethos in discourse arrangement, and to the innovative cross-category research.

Keywords: arrangement; pathos; ethos; audience; kairos

The discursiv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enterprises’ institutional identit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overseas market (p.278)

LI Yi XU Xueping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P. R.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Van De Mierop’s (2005) analysis framework, this paper studied the official company profiles of Chinese enterprises, and discussed how enterprises constructed their institutional identities and the reasons for constructing different institutional identiti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overseas markets. Results show that Chinese enterprises mainly construct intra-group/out-group identity, self-confident identity and advancer identity by realizing three discursive construction strategies of institutional identification, company presentation and the suggestion of excellence through various means. Some Chinese enterprises may also construct multiple institutional identities in one utterance.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the focus of specific identities among enterprises due to commercial purpose and social-cultural factors. The results offer a new perspective for institutional identity research.

Keywords: institutional identity; discursive construction; Chinese enterprise; company profile

Nabokov’s “chess” poetics in *Invitation to a Beheading* (p.290)

SUN Ying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Northwestern Polytechnical University, Xi’an 710129, P. R. 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Nabokov, literature is an art that takes reality as material to achieve artistry,